




南开大学211工程——经济学系列丛书

行为经济学与 中国经济行为

The Economic Behavior
of China

贺京同◎著译——

 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南开大学 211 工程

经济学系列丛书

行为经济学与 中国经济行为

Behavioral Economics &
The Economic Behavior of China

贺京同 著译

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行为经济学与中国经济行为/贺京同著译. —北京: 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2006.6

(南开大学 211 工程经济学系列丛书)

ISBN 7-5005-9099-7

I. 行… II. 贺… III. ①行为经济学②经济行为-研究-中国
IV. ①F019②F1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6) 第 048546 号

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出版

URL: <http://www.cfeph.cn>

E-mail: cfeph@cfeph.cn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社址: 北京市海淀区阜成路甲 28 号 邮政编码: 100036

发行处电话: 88190406 财经书店电话: 64033436

北京财经印刷厂印刷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880×1230 毫米 32 开 13 印张 335 000 字

2006 年 7 月第 1 版 2006 年 7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定价: 28.00 元

ISBN 7-5005-9099-7/F·7916

(图书出现印装问题, 本社负责调换)

目 录

第一部分 理论篇

- 1 行为经济学：新古典经济学的历史顺承 (3)
- 2 行为经济学：过去、现在与将来 (19)
- 3 有限理性下的均衡分析范式：随机最优反应均衡 (79)
- 4 前景理论：面对风险的决策分析 (106)
- 5 一个基于财富偏好的虚拟经济模型 (143)
- 6 行为博弈论：策略环境下的人类行为预测 (155)
- 7 有限理性：博弈论的现实困境
——基于讨价还价博弈实验的发展回顾与评述 (176)
- 8 短视损失规避与股票溢价之谜 (191)

第二部分 应 用 篇

- 9 消费平滑性与宏观政策有效性研究 (217)
- 10 农民增收：关键在于改善农民在我国收入分配中的地位
——基于行为经济学模型的农民增收难问题的根源
分析 (242)
- 11 基于行为金融学的我国基金价格波动研究 (257)
- 12 近年我国货币替代的真实原因及汇率改革后的相应对策
——基于行为经济学的诠释 (269)
- 13 投资者行为、资产价格与股市波动 (291)
- 14 中国股市的风格投资研究 (307)
- 15 投资者行为、实物经济与资产价格
——基于损失规避的股价走势与实物经济相脱离现
象研究 (335)
- 16 论虚拟经济的微观基础 (356)
- 参考文献 (365)
- 后 记 (411)

第一部分 理论篇



1

行为经济学： 新古典经济学的历史顺承

一、 行为经济学产生的 内在动因与外在条件

(一) 行为经济学产生的内在动因：从理论的量变扩张到质变飞跃

在经济学发展的初期，人们主要关注的是一国如何创造和累积财富。无论是17、18世纪的重农和重商主义，还是亚当·斯密的不朽名著《国富论》，都对物质资料的生产以及财富的分配与使用倾注了大量热情。因而，随之发展起来的古典经济学注重经济总量的

研究，关心的是国家经济问题，这涉及经济增长、国际贸易、货币经济和财政问题等各方面。然而，所有这些问题实质上都要受到各种社会关系的制约，换句话说，各种社会关系决定了经济生活中生产、交换、分配与消费的方方面面，因此经济学渐次把目光聚焦到对各种社会关系的研究上，比如：亚当·斯密在其《国富论》中利用专门的篇章来论述社会分工对提高生产效率的作用；李嘉图在其《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中利用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资产阶级和地主阶级之间的对立，来解释工资和利润、利润和地租的对立；马克思提到了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的互动关系，并论述了生产关系对生产力的促进和制约关系，其中前者涉及的是社会关系范畴，等等。所有这些对社会关系的研究，都是为了能够理解外化于其上的总量经济现象，然而社会关系涉及的是社会各利益主体的互动关系问题，因此强调和深化对个体利益的研究，就是理解社会关系的关键。

新古典革命是在这方面的尝试。新古典经济学的出发点是研究人们如何在既定资源下最大化资源的使用效率，其原因是资源配置涉及到社会各利益集团的各种利害关系，因而对资源配置的研究也就涉及到对社会关系的研究，进一步说也就是对个体利益及其相互关系的研究，因为最大化资源的使用效率必然以个体利益的最大化为前提，这样，在亚当·斯密时代就已提出的人类自利假说此时被发展为更加抽象化的理性人假说，并作为整个新古典经济学的基本假定。而这也意味着经济学从古典主义时代对总量经济问题的强调逐渐过渡到新古典时代对个体利益问题的关注。

新古典经济学通过把理性人作为最核心和最基本的前提假定，而建立起一套描述“理想状态”的个体决策及相应经济行为的理论。这套理论由于把分析目标锁定为僵化不变的“理想人”，因而必然具有一定的机械主义色彩，这与新古典经济学产生的历史环境有关。19世纪的西方世界是自然科学急速发展的时代，自然科学的理性主义以及逻辑上的完美主义使当时的经济学家深受影响，尤

其是牛顿经典力学体系的完美一致性，使得经济学家企图把整个经济学也建立成这样一个完美的机械系统，因此非人格化的理性人假定就是必要的，因为只有标准化的理性个体才会在任何经济环境下都只把最优化个人利益作为最高追求，从而演绎出所谓资源被有效配置的均衡点。

新古典经济学作为一个完整的理论系统，自身拥有一套从前提假定乃至均衡分析的逻辑体系，这使得经济学研究被纳入了体系化、规范化的轨道，并且对许多领域的问题都能做出恰当的解释。然而，新古典经济学逃不脱它的相对真理性，即它所适用的范围是有限的和相对的：大量现实经济中的所谓“异常现象”无法用新古典理论框架进行分析和预测。但这并不属于新古典理论自身的缺陷问题，而属于理论的适用性问题。在其可适用的范围内，它可以通过对这种“理想状态”的理论进行适当修改和补充来达到研究和解释不同问题的目的，比如厂商理论中在完全竞争市场与寡头竞争市场下对厂商的基本假定就不尽相同，但这属于对理论量变扩张的范畴，一些本质的特征（比如最大化假定等）不会改变。然而，随着社会的发展以及人类经济行为的日趋复杂，许多现实中的经济问题已经超出了新古典经济学所能企及的解释范围，亦即在新古典框架内的任何量化扩张都已无法对这些新问题做出解释，比如股票的溢价之谜（Benartzi 和 Thaler, 1995）和非自愿失业的根源问题（Akerlof 和 Yellen, 1990）等，此时就必须对原有理论体系做出根本性的发展与改进，而这意味着原有理论将迎来质变的飞跃，从而形成新的具有更强适应性的理论体系。行为经济学正是在这种情形下应运而生的。

（二）行为经济学产生的外在条件：心理学的成熟以及新研究工具的出现

从古典经济学到新古典经济学，经济学的研究对象从强调总量

经济问题逐渐转化为强调个体利益问题，这显示出经济学家此时已经意识到经济活动的主体“人”以及由人所组成的利益集团，对总量经济现象起到本质性的作用。然而在新古典经济学理论中，“人”的概念被简约化为刚性的理性人假定，这使得在新古典框架下，各种社会关系被作为一种机械而非人格化的关系来研究，从而导致以它为前提的经济学分析显得过于僵化，因为非人格化的“机械人”并不能再现复杂社会中人的思考、喜好和相互行为，这忽视了人具有自然和社会双重属性的事实。虽然新古典理论在解释现实问题时，可以通过一定的量变扩张来弥补机械分析的不足，但其适用性还是受到了很大的限制。为了解决这些问题，经济学家开始在其他学科中汲取营养，其中心理学的发展与成熟功不可没。

心理学是研究人类行为的一门学问，它与经济学的产生和发展相伴随，并为研究人类的各种经济行为提供来自自然科学的理论支持。亚当·斯密就已注意到了人类心理在经济学研究中的重要性。在其《道德情操论》（Adam Smith, 1759）中，他展示了个体行为在心理学上的渊源。但在当时，亚当·斯密在解释人类财富增进的机制中，仅是把人类的诸多心理浓缩和抽象为所谓的“自利”前提。在亚当·斯密之后，约翰·穆勒（John Mill, 1836）通过对斯密的思想进行形式化处理，正式提出了理性人假说。而新古典革命使得这种假说被更为抽象化与非人格化，即把经济中各利益主体的目标简单化为在一定约束条件下的最优化问题。

亚当·斯密及其后继者并没有将心理学作为指导经济学分析的理论来源之一，并且在边际革命后，经济学家更加轻视和有意摒弃心理学在经济学分析中的作用，这与心理学自身的缺陷有关。在19世纪，心理学并没有成为一门独立完整的科学，因而也就不能为其他学科提供稳固的理论支持（Camerer and Loewenstein, 2004）。然而从20世纪初叶开始，这种现象逐渐得到改观。首先是心理学中行为学派的兴起。他们的观点是，心理学不应该研究意

识，只应该研究行为，而所谓行为就是有机体用以适应环境变化的各种身体反应的组合。该观点认为人脑是一个简单的刺激—反应器，而心理学的任务就在于查明刺激与反应之间的规律性关系。行为学派的观点虽然对行为经济学中的强化理论具有重要的借鉴作用 (Camerer, 2003)，但是它所提出的刺激—反应模式却不能解释人类行为中一些最为显著的特点，比如选择性和适应性。这种局限性直至认知心理学的产生才有所突破。认知心理学将人脑看作一个信息加工系统，认为认知就是信息加工，包括感觉输入的变换、简化、加工、存储和使用的全过程，因而认知可以分解为一系列相互联系的阶段，而反应则是这一系列阶段的最终产物。认知心理学强调对人类意识的研究，即关心作为人类行为基础的心理机制，其核心是输入和输出之间发生的内部心理过程。认知心理学的一系列研究成果对推动经济学的进一步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它为经济学重新界定和发展“人”的内涵提供了新的理论基础，因为认知心理学使得行为经济学得以对经济活动中人类诸行为的心理形成机制进行研究，而不是像早期那样停留在对行为本身的外在描述上。它把人类生理机能特征与外在的经济行为联系在一起，为各种经济现象的产生提供了更加坚实的人类心理学基础，从而使得经济学的分析与预测更具有可信性 (Bourguine, 2004)。

另外，新研究工具的提出和使用也为经济学对人类行为的研究提供了更加客观真实的数据基础。在行为经济学的早期研究中，实验方法扮演了十分重要的角色，许多重大的理论发现均得自于这些实验的结果。而实验方法本身又可细分为实验室实验和实地实验 (field experiment)。但由于实验室自身无法解决的一些固有问題，比如实验环境的控制、实验激励的设置等，因而容易造成实验结果存在偶然性和缺乏一般性，因此近年来，行为经济学逐渐不再局限于实验室实验，而是更加注重对实地实验的考察，其优点是所考察的对象并不认为自己正处于实验中，因而其行为相对更能接近人类

在现实中的真实行为。同时，一些超越实验研究的方法正逐步得到采纳，这些新的工具包括计算机模拟（Angeletos 等人，2001）和人脑扫描（McCabe 等人，2001）等，其目的是更深刻地考察人类行为的心理形成机制，理论来源是认知心理学。这些新工具的应用拓展了传统经济学的视野和洞察力，使得更多的研究内容和考察方向被容纳到经济学中来。

这样，一方面由于经济学自身对研究日益复杂化的人类经济行为的诉求，另一方面由于心理学自身的发展以及新分析工具的出现，使得一些经济学家得以并开始对新古典经济学的基本假定和体系框架进行审视，以期能够突破原有理论在量变扩张下所不能解决的问题。这个过程“复辟”了过去经济学对心理学的弃用，其意义是深远的：这说明经济学家不再满足于诸如理性人这样的抽象假定，不再以建立机械化的经济学体系为最终目标，而是向更富有人情味的“人本主义”回归。

二、

行为经济学对新古典经济学的两类发展

最初的行为经济学主要着力于对经济异常现象的解释，到目前为止，无论在理论探索还是在实际应用方面都已有长足发展，其触角已涉及博弈论、宏观经济学、金融学等多个领域，但尚未形成自己独特而有机的研究体系。虽然如此，我们还是可以把行为经济学在这一时期的所有贡献大略归为两类，即分别是对经济学前提假定的发展和对均衡演绎法的发展。这两点是目前行为经济学对新古典经济学的主要发展所在，也是形成新研究体系的前提和准备。在这个过程中，心理学在经济学中的作用受到了再次重视，但这并不是

问题的全部，心理学不过是深化人类经济行为研究的一个跳板，经济学在未来发展中不应留有过多的心理学痕迹。实际上，心理学只不过是指导经济学家抽象出新的前提假定、进而推进新研究体系形成的理论来源而已，最终留在经济学框架中的是那些发展于一定心理学基础之上的新假定和新研究范式，而不是心理学原理本身。

（一）对新古典经济学前提假定的发展：从同质的理性人到异质的行为人

新古典经济学理论的假定是一种标准化的假定，即认为决策者是同质的理性个体，他们在面临相同的环境时会做出相同的决策，因而缺乏必要的变化性与灵活性，这势必会使理论过于僵化并导致其适应性受到制约。有鉴于此，行为经济学家试图发展出一套更具一般性的基本假定，这些假定应更能体现人类的真实行为特征，从而在不同的领域中可修改和补充的余地较大，或不需要做过多修改和补充即可满足研究的需要，这样就增强了理论的适应性。

这种对旧有假定的发展主要可分为两个方面（Camerer, 2003, 序言）：其一是对效用概念的发展，其中最重要的是社会性效用理论的提出。该理论认为，作为个体的人会把他人的效用纳入自己的效用函数（Rabin, 1993），即人们具有一定的利他主义动机。实验研究显示，在人类的幼年时期表现出了更强的自利倾向，这与新古典理论的假设条件更为接近，然而人类在后天为了维持群体的整体利益而逐渐形成了利他主义倾向（Damon, 1998），并且不同个体的利他主义动机以及利他目标是不同的。这为传统效用理论进行修改提供了社会心理学基础。其二是对理性内涵的发展和再认识。新古典理论的理性人假定认为决策个体可以最大限度地计算收益和损失，从而最大化自身的效用，但实际上这完全是经济学家的一厢情愿，个体不但无法精确做出各种计算，而且不同个体之间的计算能力也不相同。Camerer（2003，第五章）在考察了若干针对人们思

考和推理的实验后总结出，人们在面临日常经济生活时的思考和推理步骤一般在两步左右，这与人们的智力约束有关，也与人们对思考成本（痛苦程度）的评价有关。这引出了有限思考的概念，并深化了经济学对人类理性程度的理解。

无论是对效用概念的发展，还是对理性内涵的发展，都放松了理性人的标准假定。而一旦理性人的假定得到放松，则意味着对人的假定摆脱了一个外在强加的刚性标准，从而必然导致同质的理性人向异质的行为人转变，这属于理论的质变范畴，但前者却可看做是后者的一种极端情况或特例。异质行为人的假定更符合经济生活中的一般情形，它为行为经济学体系的建立提供了最为基本的前提。

然而，在异质行为人的假定下，如何来开展经济学分析呢？我们知道，任何经济现象都是社会经济生活中无数微观个体进行博弈的结果，但我们在研究具体问题不可能如此详尽地涉及各个互动过程的具体细节，我们必然要采取一些较为简约和近似的方式，这就是把对每个问题的研究分化为作用主体和作用对象，并研究它们之间的作用关系。其中，作用主体具有一定人格色彩，可以是现实中的人，也可以是由人所组成的群体或集团，比如企业等。而作用对象则相对缺乏人格性，它或者来源于物质的客观世界，比如生产资料等，或者是人类社会中的各种经济现象，比如制度安排、货币流通速度、虚拟资产和消费价格等，这些经济现象实际上也是人与人互动的产物，但在经济分析中却可把它们抽象出来作为缺乏人格的作用对象，以便于分析的简化。然而，在新古典经济学中，只研究了同质的理性主体与作用对象的关系，比如在完全竞争市场模型中，仅考察某一厂商在市场中的行为就可以了，因为其他任何厂商都与它是同质的。但在行为经济学中，异质行为人的假定必然要求各行为主体的行为都必须予以考虑，比如在行为资产定价模型中，投资主体就被分为理性套利者与噪音交易者两类来分析。但这些分

析却仅涉及异质主体与同一作用对象的关系研究，而未考虑到作用对象实际上也是异质的，比如不同的环境和文化下人的行为也将不同，不同国家资本市场的表现特征也不同，这就需要我们进一步去放大作用对象的差异，从而增进经济学的解释力度。近年来行为经济学家已经注意到了这些方面，并已经通过设置实验来分析异质的行为个体在不同实验环境下的表现。行为经济学家甚至还在不同国家中进行同一种实验来了解不同文化和社会约束对行为主体的影响（Roth 等人，1991）。这是行为经济学继续向前发展的方向。

（二）对新古典经济学均衡演绎法的发展：学习理论

经济学的逻辑演绎过程可分为两个步骤，其一是构建一定的前提和假定，其二是在这些前提假定下推导出一定的结果，达到所谓的均衡。实际上，第一个步骤确定了我们所要研究的是什么样的经济环境以及什么样的经济主体，第二个步骤是指我们“替”第一个步骤中假定的经济主体寻求均衡点。在新古典经济学中，我们是在“替”理性人寻找均衡，即在逻辑上推出理性假定下所能导致的行为及结果。但由于对理性人的假定过于严格和同质，因此对均衡的推导是僵化和一次性决定的，而对于个体提高决策能力和加深互相认知的过程却无法考察，但这恰恰是理解均衡产生过程的关键。更为重要的是，如果仅凭逻辑演绎法来搭建从前提假定到均衡点的桥梁，而阉割掉均衡产生的具体过程而不顾，那么这必将导致对现实经济现象理解的片面性。

在异质行为人假定下所进行的分析，却会给人们带来一幅全新的经济学图景。具体地说，在异质行为人假定下，我们是在“替”更有人性色彩的经济主体去寻找均衡。此时，由于前提假定不再过于抽象化和绝对化，并且本身就暗含了人类行为特征的复杂性与差异性，因此从这些前提假定发展出来的理论就具有更强的开放性，从而也就有可能以不同的方式、甚至是非逻辑的方式来开展经济学

分析，而不必拘泥于特定的逻辑演绎法。在同质的理性人假定下，决策个体由于是绝顶聪明的，并且也知道所有个体都是决定聪明的，因此他们被赋予了通过严密逻辑计算而一次性求得均衡点的能力。然而，在异质行为个体假定下，这种一次性求取均衡的能力完全是一厢情愿，经济个体根本无法按照新古典经济学指定的完美逻辑来确定均衡行为。实际上，由于他们受到各种行为能力的制约，比如损失规避^①、有限推理等，并且各自的行为能力又各不相同，因而在不断的学习中逐步提高自身的决策能力以及对彼此的认知程度，进而渐次摸索出均衡位置。对照于新古典经济学中的逻辑演绎法，行为经济学相应地在异质行为人假定下提出了“学习”这一研究经济个体寻找均衡点的新概念和新方法（Fudenberg 和 Levine, 1998），其理论来源是心理学中的行为学派和认知学派^②。经济学家之所以逐渐重视对均衡产生过程方式的研究，是因为大量现实经济现象并不是均衡的结果而是处于趋进均衡的过程之中，而“学习”恰恰反映的是均衡产生的过程。这是一种由混乱到有序的嬗变过程，它揭示了人类行为过程的复杂与多变。另外，经济个体通过“学习”甚至会达到不同于以往经济学理论所推断的均衡位置（Mckelvey and Palfrey, 1995）^③。

① 这是由 Kahneman 和 Tversky (1979) 所提出的一个概念，它揭示了决策个体在面临不确定的损失时要比面对等量不确定收益时表现出更大的心理波动，从而影响其决策结果。

② 其中受前者影响而发展出来的强化学习理论是系列学习理论的先驱（Bush and Mosteller, 1955），而后者对学习理论的贡献则是根本性的，因为它进一步把人们决策的过程看做是基于一定心理机制的不断搜寻和处理信息的过程（Fudenberg and Kreps, 1995）。

③ 一个针对纳什均衡的替代性理论被称为“随机最优反应”均衡，其中，参与者根据对其他人行为的信念来计算不同策略的预期支付，但他们在形成信念的过程中会受到某种随机因素的干扰，故而不能总是选择纳什意义下的最优反应，而是根据一种统计学原则来选择策略，其中较好的反应会得到更多的选择。尽管如此，参与者仍然能够达到一个他们所认为的彼此“最优反应点”，但这是一个不同于标准纳什均衡的均衡。